



讴歌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熊召政

人的岁月称之为年龄,国之岁月称之为国祚。古人到70岁,被称为古稀,而国到七十,碰到好的朝代,则以中兴誉之。今日,70岁的人再也不是古稀之年了,而70岁的国则愈显朝气。人之龄比起国之祚要短了许多,今日70之人属于壮年,而70之国,则是青春弥漫了。

记录人之岁月,称之为生平,记录国之岁月,则称为春秋。两者都是历史,但人之史与国之史,从其规模与风貌来看,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固然,国之历史是通过人的历史来展现的,但人之杰有千千万万,国只有一个。杜甫《望岳》诗有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中华历史的高峰上,看历史历代的杰出人物,也只是尽收眼底的众山而已。

之所以说中国历史悠久,乃是因为数千年历史从未中断,无论有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从不曾被灭国。这一点与地中海文明养育的欧洲有着根本的不同。今日欧洲之英、德、法、意诸国,绝不是亚历山大与罗马帝国的延续,这两个远古的地中海强国早已灰飞烟灭了,而当下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仍是远古中国的延续。中华民族既没有被灭国,也没有被灭种。我们有一个朝代纪年,夏商之后,简略称之为“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只是大的朝代的更替。其实每一个朝代里都有些分支,有的朝代甚至平行存在几个政权,但这些政权的执政者都以为自己是中国。

我本是一个历史小说作家,阅读史籍,研判史势,探究故实,寻找规律,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必做的功课。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理解中国精神。地中海文明的智者冥思苦想“我从哪里来”,中国的智者则秉承“敬天法祖”的旨趣,在“天人合一”中找到适者生存的方法。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便是客观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四个自信”,便是今日执政党所秉承的“道”。

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首先要磨砺辨道的学问,在此基础

上当一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遵道者。古人言“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就是提醒遵道者辨清每一个时代不同的追求和特质。疑古不化是为执,刻舟求剑是为妄,去执去妄,是求道者最难做到的事,惟其难,才值得我们终生追求。求道的过程,便是学思践悟的过程。判道、证道、遵道、殉道,不离不弃、矢志不渝者,才可称得上是有家国情怀的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漫长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时代演绎过如此澎湃激烈的春秋大义。置身其中,深感火热的生活是难得的不言之教。虽然期间有曲折和反复,有坎坷和艰难,但时代的大方向是奋勇向前而合乎天道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民族复兴的伟业,也是亘古未有之史诗。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这不是诗人的形容,而是我们的现实。

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我们的改革大业、复兴伟业。讴歌改革、赞美复兴,这是作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作家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除了立场之外,还需遵循文艺的规律。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宣传品,无论是一首歌、一幅画、一部电影,还是一部长篇小说,首先都要是艺术品,然后才能鼓舞人、教化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举行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评价当时的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这真是一语中的。时代精彩,可是我们的文艺作品不够精彩,究其原因是离开了生活,偏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趋势。浮躁如同感冒,是可以流行传染的。如果一个作家定力不足,就会染上这种时症而不能自拔。

改革初年,我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上世纪90年代才开始进入历史小说领域,我花了10年时间写了一部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乃是我深感改革的新形势下,勇于任事的人太少。于是,我找到了开创明万历

新政的铁血宰相张居正,通过他的改革实践,揭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2005年,我又开始关注北宋这段历史,当时之中国,并行有宋、辽、西夏三个政权,尔后大金崛起,只用了11年时间,就灭掉了北宋与辽,从而成为华夏土地上版图最大的国家。唐与宋都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朝代,但结局都不怎么好,特别是北宋,文化与经济都非常发达,可是却被女真人建立的大金打得卸甲丢盔,逃往江南偏安一隅。中国这个中世纪的大三国,先是北宋、辽、西夏,后来是南宋、金、西夏,这一期间诸民族之间演绎的华夏史,比起当年的魏、蜀、吴小三国,其激烈与复杂性都要丰富得多。单从汉人的角度,我们对这段历史或许会感到不快,甚至加以排斥、诋毁,但是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我们就会觉得这段历史有着特别的意义,对于当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与思考价值。

从2005年秋天开始搜集资料,2007年秋于长白山起笔,到今年的7月15日,我在鄂尔多斯完成了《大金王朝》四卷本书稿,不知不觉又花去了14年时间。如果说《张居正》的创作初衷源于改革,那么《大金王朝》的创作动力则来源于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的进程。

通过两部历史小说的创作,我感悟到作家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无论乎古今中外的大作品都是在冷板凳上写出来的。

中国历史是由众多的朝代连缀而成的,国、朝、代是连属而层次分明的,这是中国历史的特色。国不更易,永远是中国,在国之内,改朝换代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个政治集团建立一个朝,一个皇帝又开创一个代,一国数朝,一朝数代。研究国、朝、代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我在历史小说创作中首先关注的问题。当下之世,习近平总书记率领中国进入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既让我们虔诚地思接千古,也让我们豪迈地面向未来。

我是当年所谓“生在红旗下”那辈人中的一个,虽不是共和国同龄人,却也差不多可称与共和国同行。可以说,这个年龄段的作家都是新中国文学70年岁月的历史见证者。

1979年的时候,我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转眼又过去40年。这40年里,除了从我工作、生活的一个相对偏远的地方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外,还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参与了这一历程。为此我倍感荣幸,但最难忘却的还是新中国文学早年的蓬勃给我的滋养。

记得自己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铁道游击队》,算来是在1962年,我读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这部长篇小说首发于1954年,1956年由该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其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风靡全国。有一天我在小学图书馆里发现了这本书,向管理员提出借阅。管理员看我个子小,听说只是二年级鼻涕虫,他面露怀疑,问我能看得懂吗?我坚称自己可以。管理员告诉我,按照规定,必须在一周内还回这本书。我表示没有问题,终于为自己借到了人生中第一部长篇小说。记得那本书似乎有近600页,当时我告诉自己如果每天能读100页,就肯定能把书读完。于是便按这个目标努力。当时我认识的汉字或许还不上千,这本长篇小说里的生字很多,于我好比一个个坑,掉下去就上不来。我采取迂回方式,遇坑则绕,或者凭上下文去硬猜其意,跌跌撞撞、坑坑洼洼,居然在规定时间内把整本书啃了下来,读出了意思,觉得特别过瘾,特别有成就感,比看电影还带劲。这次阅读除了让我格外钦佩那些能在奔驰的火车上飞身而下的八路军英雄好汉,朦胧胧胧还初步有了某种民族国家意识。这部长篇小说还让我从此记住了一个名词,那就是“作者”。此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通常会有的阅读经历,读过一些童话书、小人书和儿童杂志。无论读什么,我都是一下子陷进故事,从来无视作者署名,不在意故事是谁写的。直到读这部厚厚的长篇小说,依然还是这种习惯。当时我到处向人宣布自己读过《铁道游击队》,不是小人书,是大本书。有一个大人问我: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我顿时语塞,无言以对。后来我特地到学校图书馆再去找那本书,从此记住了“刘知侠”三个字,也知道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作者,他应当和他写的故事一起被记住。

我与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融于魂灵

□杨少衡

这本书开启了我的长篇小说阅读之旅。不久以后,我又找到了一个比图书馆更方便、快捷、宽容的小说阅读渠道。我到一位同学家里玩,意外发现他家的书柜里竟有众多长篇小说,一本本排了几书架。《红日》《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红岩》《苦菜花》等等,听说过的书应有尽有。同学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国有企业掌门人,似乎没听说他喜欢看小说,他有两儿一女,或许他买这些书是想让他们去读,期待未来家里也出个作家?相比起来,我父亲也有一个大书柜,书也很多,主要是政治理论类,文学书也不少,基本上是历代诗词,当时我不感兴趣。我的同学和他父母、兄妹都非常慷慨,允许我将他们家的书柜视同己有,随时可以拿书,没还回来也从不催讨。短短一两年,那书柜几乎被我搬空,其中有许多被我读过之后又拿去与其他同学换书读,从一手转到另一手,直至不知所终。后来每想起这些,我心里还很内疚,同时又非常感激,因为我几乎借此读尽了当时出版的最好的那一批中国当代小说。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新中国文学七十年早期的那些经典之作。

随着时代与生活的变迁和自己写作经验的积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读了古今中外很多小说,阅读面得以拓展,才敢自称有所见证。有趣的是,尽管后来读得多,有不少体会,会为新鲜的表现拍手,为独到的作品折服,有所领悟也有所借鉴,但是平心而论,对我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少年时就深深铭刻于心的那些作品、人物和故事理念。以至于如今自己写小说时还会突然发现,笔下某个人物似乎有记忆中某个小说人物的影子,环境虽大不相同,气质与精神却相通。我把这理解为时代与人生的烙印,亦是新中国文学经典给我的滋养,早已悄然融于魂灵。

红色血脉流贯笔端

□石 英

我少年时代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从事机要密码、电报工作。我在正式参军前,即在胶东故乡解放区一面读书,一面投入了义无反顾的革命活动。1947年春,我参加了当时在部分解放区秘密试建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作为“少年儿童宣传队”的一员,随本县支前大军两赴前方支前劳军,经受战火的熏陶和历练。四年前,我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写过一首题为《战争中没有“小孩”》的短诗,就是当时的切身感受。

我的思想政治信仰就是在战争环境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党的教育,部队首长、地方干部、农村老党员、老师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我的激励、呵护与期望,那种真诚、纯朴、平等、公正,令人深切感动的情景数十年也未淡化,至今回想起仍历历在目。

在我上初小的那个时候,本乡那一带还在日伪压榨之下,我和我的家庭受尽了财主、恶霸以及恶少们的欺凌,正是八路军的“信风”吹临,才使我抬起头来看到了光明,获得了新生。这种巨大而鲜明的人生反差,使我心灵中萌生的感恩意识至深,如《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拯救了我》《一个夜晚跨越了一个时代》《良性感觉就是恩》等,都是这些历史记忆与情感经验的诗文记录。“记忆没有距离,良心忠于历史”,这两句痛彻心扉的话我始终铭记于心。

在机关要部门忘我的工作就是对革命、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感恩与回报。新中国诞生之初那几年,工作异常忙碌,经常是日夜“连轴转”。过于劳累以至吐血,还不想叫领导看见,自己悄悄用煤灰遮盖,只恐被迫去休养,不是说“重伤不叫苦,轻伤不下火线”嘛。在那年月,我这种似乎有点幼稚的想法与做法其实很正常。

1956年,我响应当时国务院的号召报考大学,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了5年,弥补了因过小参军而学业不足的缺憾。在中文系,我也开始圆自小喜爱文学的梦,在大学期间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作品,并出版了三本文学传记,其内容仍与我的红色“基因”有关。由于“基因”,由于阅历,在我此后若干年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红色诗文不可能不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共和国六十华诞前夕,我出版了诗集《走向天安门》,力图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与意象营造上有新的创造和突破。2012年,我在此基础上发展扩充,将抗美援朝和新中国成立后的英烈壮举纳入文学视野,出版了《石英红诗选》。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前夕,又结集出版了收录70篇散文的《历史的红色纹理》,其中多数篇章为近年来的新作。

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到耄耋之年,数十年间我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但回首以往,又觉得对国家和人民的回报还很有限。今后我将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愿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生命历程同步,老而不凋仍能有所焕发。

“爬格子”的意义

□秦文君

纵观新中国70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成长历程,公认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40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中国社会的开放,艺术追求和儿童文学的审美作用逐渐被重视。

儿童文学不一定要有触目的理念,但它的内涵必须要用高超的审美手段来表达,需要蕴涵人类的情感和本质,更要揭示生活的规律,触及人心。

新媒体的悄然兴起,使孩子的接受方式开始变异,小读者要有悬念的故事,要有趣味的角色,要求轻盈快乐的阅读。于是游戏精神和儿童本位的呼声得以高昂起来。艺术个性是儿童文学的最高尊严,但是趣味也能体现

都是老老实实、扎实的“爬格子”的人,而不是“跳格子”的人。

从1982年起,我出版了70多本书,获得各种奖项也有80次。虽然现在用电脑写作,但在我的心里,还是更愿意把写作称为“爬格子”。刚写作的时候,普通的稿纸是方格的,每一个字写在格子里,一笔一画地勤耕耕耘,一格一格地认真书写。我最向往的生活是爬一辈子格子,所拥有的是笔、深度的眼镜、清贫的生活和一屋子书,虽然有苦有累,但从未松懈过,没有失去爱和勇气。

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功利化的倾向。在这

个时代环境下,作家自身的坚守变得很重要,儿童文学作家应该呵护美好的姿态,维护独有的价值,保持高雅的追求,沉得下心,保持内心强大的宁静。一个作家的造化,取决于作家对艺术的态度,取决于作家的心灵家园是否丰富。艺术的造诣能否提升,取决于文学的创造能力、叙事能力,以及对人的描摹、情景描写、价值判断、语言魅力等综合能力。

我希望因为内心强烈的创作冲动而去“爬格子”。“爬格子”是忠于独创的,严谨而艰难,也是坚持自我,让一种勃勃燃烧的精神内力永远不会改变。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为中国儿童带来优质的文学作品。

母亲的文化性格决定儿子的品质

□欧阳黔森